

# 暗夜中的潛行者

——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探讨

梁艳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暗夜中的潜行者

——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探讨

梁艳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中的潜行者：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探讨 / 梁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11  
ISBN 978-7-5426-3958-5

I .①暗… II .①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500 号

## 暗夜中的潜行者：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探讨

著 者 / 梁 艳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李 珏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黄钰文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0.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58-5/I. 631

定 价 / 28.00 元

## 《〈今天〉(1979—1980)研究》序

陈思和

在“文革”后三十年的文学史上,《今天》的故事永远是属于今天的。只要翻开近十年出版的回忆录和访谈录,无论是打上了七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的标记,其中都离不开《今天》的声音。或者说,文学史上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系统的符号,从“文革”时期的民间读书思潮、潜在写作、知青文学一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的海外汉语写作,都活跃着这个《今天》的幽灵。它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轨迹,自成体系,与这三十年的主流文学史若即若离保持着张力。

记得在1996年我收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学院的邀请,去参加一个主题为“沟通”的国际作家对话会,到了瑞典才知道,参加会议的,除了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罗多弼、盖玛雅等几位以外,几乎全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这个会议的发起者是陈迈平,也就是著名的《今天》派小说家万之,参加会议者中有当年《今天》的诗人芒克、多多、严力、小说家有史铁生,从海外赶来的,还有诗人杨炼与友友,非《今天》派的有高许健、林白、余华、格非、朱文、朱伟,等等(可能还有谁,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从这个阵容来看,有一半的与会者是当年《今天》同仁,换句话说,万之在组织这个会议时也是有意识地把当年的朋友都召集到一起,他们重新相聚于海外,自然有一番抚今追昔感慨当年,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关于《今天》的言说,他们的方说与我们平时流传的有关《今天》的故事不尽相同,也使孤陋寡闻的我,我第一次有幸识荆从多的《今天》元老,一种新的文学史视角在我面前徐徐拉开。后

来我在当代文学史上提出了潜在写作的理论,最初的感触可以追溯到这个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故事。

由于这是一个与主流叙事不尽相同的文学史记忆,所以围绕《今天》的言说,形成了一支庞杂的回忆大军,在每个时代都有人出来演绎他伞兵文学故事。这些内容是不无夸张的,被修饰过的,至今仍灰通过口传文学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颂着。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文革”时期北京的地下沙龙的回忆。这个现象本来与《今天》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追溯北京的地下文学渊源时,很多人都把眼光关注到这个现象。其实,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会有中学生的自发读书活动,这种活动,一般包括一起读书、交换图书资源、交流读书信息,等等,读书活动需要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往往是几个读书爱好者聚集在某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道家里进行。然而,这样一种极为普遍的经验,在一些当事者的回忆里就逐渐地变成“地下沙龙”,其含义也随之变得高贵脱俗、与一般的社会阶层分离开去,成为一种高干子弟特有的接受教育的途径。而“文革”时期普遍荒芜的严酷环境被遮蔽了。这里当然不是追究存在不存在这样的读书经验,而是这种经验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作用?是不是当时文学资源的一个主要渠道?我读有关知青文学、“潜在写作”以及地下民刊的诞生等回忆录,很少看到诗人们就如何发生创作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做出认真思考,而片面强调所谓的读书资源(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等等也都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本身也是一种被夸饰了的神话。

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我的印象里,关于《今天》一向是言说者多,研究者少,把《今天》放在文学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所以,当梁艳提出要以《今天》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毫不犹豫就肯定了这个题目的意义,并且希望她能够把《今天》、研究作为人事脉络的“今天派”,以此窥探三十年来文学史上疑而未决的理论问题,而不要仅仅对诗歌做文本的审美分析。(对于诗歌的强项。)因此,梁艳把研究视角放在人事关系及其发展之上,走访了一些当事人,尽可能地在细节上追究《今天》的历史原貌。

染艳原来的专业是生物,而不是科班的中文,但她是怀着极大的热忱投入这个题目的研究,显现出一个理科生一丝不苟的态度。我当时曾建议她访问远在北欧的陈迈平,我预感到陈迈平会向她提供一个视角新颖、不同于一般流言中的《今天》的历史,也肯定能够帮助她更加客观地看待当年的潜

在文学。但这个要求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未免太难，我当时也只是一个建议而已。没有想到梁艳却是认了真，不久以后，她真的找机会出差瑞典访问了陈迈平，在迈平的地下书库里，她如愿以偿地感受到了 1978 年的中国历史，为了写作文化和赢得时间，她还申请了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住了一年，边找资料边听课，心无旁骛地完成了论文的撰写。

梁艳是个细心的人。我觉得她在理论上能够重注史料的细节，由小见大，长于分辨，提出自己的新见。在如在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时，学术界对《今天》的创作与朦胧诗常常混为一谈，但事实上因为朦胧诗的争论影响大，无意中遮蔽了《今天》刊物上发表的其他类型的作品，如小说和批评等。梁艳通过细读刊物上的原始材料，提出了《今天》派与朦胧诗派的不同之处，她发现在朦胧诗争论中获得大名的诗人如顾城舒婷等，都不是《今天》杂志的骨干，同样回溯到“文革”后期知青潜在写作，如最出色的诗人多多，也不是《今天》的骨干作家。为此，她在论文中对新诗潮、朦胧诗、《今天》派的创作一一作了厘定。还有一些更细小的方面她也没有放过，如关于朦胧诗的概念来历，一般我们都认为来自章明的一篇批语朦胧诗的文章，后来是反面文章正面做的意思，而梁艳采取了另外一种说法，指出了谢冕在后来引起争议的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里，比章明更早地使用了朦胧的概念。这些说法虽然都是比较枝节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认真和细心，是不能作出这些发现和判断的。

关于一些比较大的文学史问题，梁艳也有自己的发现和观点。譬如，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有一种看法，《今天》派的创作是属于当时“伤痕文学”思潮的一部分，但这个说法引起了北岛的愤怒，他举证了当时《今天》杂志上有两篇文章是批评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和卢新华的《伤痕》的，这是不错的，从主观上看，北岛为代表的诗人和小说家自然不会认同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思潮，但是我们如果从七十年代末的创作思潮来看，“伤痕文学”不仅仅指《伤痕》或者《班主任》，它应该是涵盖了整个“文革”后涌现出来的第一波揭露和控诉“文革”血腥岁月的现实批判思潮，这股思潮起自民间大地，主潮是民间抗议法西斯专制在中国整整十年的罪恶统治和横行，但这种反叛和抗议只是在部分的意义上被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如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认可，其更加深刻的意义是不可能被接受的，所以，真正的“伤痕文

学”只能是涌动于民间的潜在写作,只有部分作品通过妥协才能够被曲折地歪曲地发表出来(如当时很多“伤痕文学”不得不添加一个光明尾巴),因此,我们考察“伤痕文学”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些公开发表的文本,应该看到隐藏的民间大地更为深刻的抗议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创作之所以有一个艰难的被主流社会认可的过程,正说明了它从本质上反映了当时抗议“文革”的最有活力的文学,也正是体现了当时“伤痕文学”的真正的核心价值。梁艳在这个问题上既没有回避也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阅读文本出发,仔细分析了当时发表在《今天》杂志上的小说诗歌作品,分析了这些作品与“伤痕文学”的关系。我这次写这篇之前,为了证实梁艳的观点,特地把《今天》影印本又翻阅了一遍,当时的印象又清晰地浮现出来,觉得梁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现在梁艳这部论文要出版,她希望我为些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但是我还想指出的是,这部论著对于梁艳研究《今天》而言,还是很初步的尝试,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的《今天》,一直贯穿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它的研究其实是一种跟踪式的研究,还有许多未开垦的领域可以去进一步的发掘。任重而道远,是我要与梁艳共勉的。

2011年1月20日于鱼焦了斋

## 前 言

梁 艳

本文以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的民间刊物《今天》为研究对象,以《今天》杂志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重要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为主要内容,力图在爬梳考析《今天》所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具体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回到现场、情境再现的方式,重新描画“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学场景,并由此参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的学术再讨论,为中国当代文学“前、后三十年的断续和转型”问题提供必要的史料支持和思想资源。同时,本文还希望通过《今天》杂志与“朦胧诗”论争的关系的阐释与探索,勾连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沟通杂志研究与思潮研究,为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做好《今天》杂志的研究,作出更多的路径尝试。

第一章,述说《今天》产生的历史背景、缘由,诠释其史前史。“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沙龙的影响、诸种内部书籍所产生的效应、以北京知青为主体的文学群落、“西单墙”的出现等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了《今天》这份民间刊物的产生。以此为基础,本章进一步论述《今天》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并由此界定《今天》在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所处的文学史位置。

第二章,考辨《今天》杂志从创刊到停刊的具体历史情形。面对“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今天》的编辑和作者们经历了漫长的荆棘之路,一步步将《今天》推到了历史前台;而在“文学性”与“政治性”孰轻孰重的重大决断面前,《今天》内部的“组织者”和“艺术家”呈现了不同的抉择。钩沉这些历史陈迹既是为了还原现场,更是为了今后的借镜。

第三章,研析《今天》的若干代表性作家与作品。诗人们各自如何进入

《今天》杂志的过程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本章在多方考据、互文参证的前提下，厘清了一些细微却也关键的文学事实；这既是对创作者当时的诗歌观念和文学信念的真实重现，更有助于阐明《今天》内部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第四章，探究《今天》与“朦胧诗”论争的关联。一方面，经由“朦胧诗”的命名与论争，《今天》的诗人与诗作扩大了受众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场论争之后，主流文坛以局部的收编与吸纳的方式更深深地压抑了《今天》杂志的存在。本章在夹叙夹议中回顾这段历史，以期在更长的文学史进程中定位《今天》的得失与后果。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近些年来所披露的大量文学史料，是一种偏重于文献和史实的杂志研究；本文祈望自己所着力的考辨工作有史料学上的去粗存精之效，能为更细致饱满的文学史写作构筑更坚实的基础。同样，本文在史实辨析前提下的阐释和论述，多半属于拾遗补缺、添砖加瓦的工作；不避其微，不贪其深，力图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是为了《今天》乃至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研究能够更加全面而深刻。

# 目 录

《今天》(1979—1980)研究》序 .....	陈思和	1
前言 .....		1
绪论 .....		1
第一节 “异端”的出现 .....		2
第二节 集体记忆:还原历史的可能性 .....		6
第三节 《今天》之于“新时期文学” .....		8
第四节 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		12
第一章 地火依然在运行:《今天》产生的背景 .....		17
第一节 内部读物的出版与阅读 .....		18
第二节 地下沙龙活动 .....		27
第三节 个体与群落:知青地下文学创作 .....		33
第四节 发声的新场所 .....		41
第二章 《今天》从创刊到停刊 .....		45
第一节 《今天》的创刊 .....		46
第二节 《今天》编辑与发行 .....		49
第三节 围绕《今天》系列活动:作品讨论会、 诗歌朗诵会、星星美展 .....		53
第四节 停刊 .....		59

<b>第三章 《今天》的创作论 .....</b>	61
第一节 《今天》作品概述 .....	62
第二节 与《今天》有关的几位诗人 .....	72
第三节 面对“伤痕文学” .....	85
<b>第四章 “今天派”与“朦胧诗论争” .....</b>	93
第一节 《今天》与《诗刊》 .....	93
第二节 《今天》与“朦胧诗论争” .....	98
第三节 朦胧诗·新诗潮·今天派 .....	111
<b>附录一：文革期间地下读书活动所涉及的相关书目(部分) .....</b>	117
<b>附录二：《今天》主要成员简要年表 .....</b>	123
<b>附录三：《今天》杂志目录 .....</b>	143
<b>附录四：《今天》编辑部活动大事记 .....</b>	149
<b>参考文献 .....</b>	151
<b>后记 .....</b>	160

## 绪 论

被认为文化单一甚至文学是一片空白的“文革”结束不久,《今天》(1978—1980)<sup>①</sup>出现了,它在当时物质条件落后,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却以一种完全异质的形态呈现出来,不仅在民间刮起了一股不同于主流的文学之风,同时更是不可思议地被主流文化接受、吸纳与改造,并且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朦胧诗论争”,如今这一切在研究者眼里似乎并不是奇特的事,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异质”文学期刊,并将这段历史写入文学史中,《今天》中的部分诗歌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今天》杂志本身也在口述史、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中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但在越来越多的关于《今天》的论述和言说中,对它的谈论却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定位以及历史细节的碎片式的点滴描述。《今天》杂志及其刊载的作品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以及围绕着《今天》所产生的新诗潮、朦胧诗等这些概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系统研究和分析,想要厘清这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究其原因诸多,但最主要的恐怕是第一手资料的缺乏。《今天》是在1978年至1980年在民间印刷的,未进入公开发行的渠道,仅依靠民间流传,留存下来的多数是不完全的版本,《今天》的研究者要搜集全套原版的杂志已非易事。我们的研究往往借助的是二手甚至三手的资料,更不用说进行不同版本的比对辨析<sup>②</sup>。我们对《今天》发表的诗歌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后来《北岛诗选》等个人诗集或如《五人诗选》等诗集的出版才得以获得,但很

---

① 本文中《今天》都是指1978—1980年的民间刊物《今天》。

② 例如《诗刊》上发表的文章与最初在《今天》上刊登的版本或多或少的发生了变化。

显然不够全面；同时《今天》中所刊载的小说，除了北岛《波动》之外也很少进入我们研究视野，而对小说的研究则侧重在小说本身，缺乏与杂志整体的勾连；另外翻译和评论文章（比如有关“伤痕文学”的讨论<sup>①</sup>），也没有从杂志研究的角度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今天》的作品选择与安排又恰恰是极富洞察力与深意的<sup>②</sup>。因此，全面展示和研究《今天》原刊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文的研究所主要依据的版本为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于1997年10月11日发行的《今天》（1978—1980）影印版，将《今天》的第一期至第九期，以及在《今天》停刊后以文学研究会内部交流材料出版的三期，收集在一册。<sup>③</sup> 力图做到聚焦《今天》杂志本身，以第一手资料为起点，展开它的文学背景，研究它发表作品的艺术价值，讨论它在文学史上它的意义和地位。

## 第一节 “异端”的出现

“异端”这个词是个相对概念，民间刊物《今天》表现出的异端性在今天来看也只不过是恢复“历史连续性的本来面目”<sup>④</sup>，《今天》既不是文学中不存在的历史片断，也不是存在文学历史中的怪物，它是存在于相对文革时期主流文化的一种“异端”。洪子诚分析文革时期的“诗歌”：“地下诗歌”相对于“公开”的诗界，在当时特定情境下具有“异端”的性质，它们之间也构成了潜在的对立状态<sup>⑤</sup>。对于这种“异端”性质的判定，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衡量，何况在历史中异端思潮的出现是不断的。异端意味着反抗，对当时的传统文化、制度的反抗，通过语言文字表达的一种反抗。我们的“文化伴随新生的时代精神而生，对于先它而在的社会来说，它是陌生的、异质的，它

<sup>①</sup> 在《今天》杂志上，其中有两篇重要的有关“伤痕文学”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林中）第一期；《评〈伤痕〉的社会意义》（史文）第四期。

<sup>②</sup> 包括的范围是从诗歌、小说到文学评论，作者也是包括从北岛、史铁生到阿城（在《今天》曾以文学评论家撰文）等。

<sup>③</sup> 在这个影印本中，第一期是当时的重印本，因为在《今天》发行到第五期由于售罄所以重印了，收集成册的《今天》创刊号是重印本（1979年10月，创刊的首印本是1978年12月发行的），而从第二期到第六期1979年完成，从第七期到第九期和三本内部交流材料都是1980年完成，这个版本的发行对保留《今天》的原始模样，研究者可获得全面的材料功不可没。

<sup>④</sup> 参见宋永毅、孙大进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出版，1996。

<sup>⑤</sup> 参见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向以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结构、意识挑战”<sup>①</sup>。异端自然的流露，以反抗形式表现，最终异端转化成了传统，异端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是痛苦的，甚至被蹂躏践踏。《今天》被接受的过程似乎比较幸运，但是仍处于边缘，终归是“异端”，直至21世纪的文学史写作中才开始正视这个曾经存在多时的“异端”。“异端”的诗人从一开始的创作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主流作品的风格，毫无共同之处，到现在可以客观地说是“大大越过五六十年代诗的普遍的思想艺术形态，表现了诗歌革新运动的‘前卫’姿态”<sup>②</sup>。这种前卫更多表现在“它的语言上的‘异质性’”，“诗风拒绝所谓的透明度，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或主导意识形态合作，拒绝被征用和被操纵，它的符号作用其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反叛”。<sup>③</sup> 反叛是“异端”产生的根源，对于存在的事实他们是用“我不相信”的姿态面对，现实的事物不可能遮蔽他们的视野，内心处于骚动，对现实的不满从“拒绝”到“反抗”，用语言上的“反抗”代替血肉模糊的“战争”。

“异端”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鲁迅刚硬的人文性格和反传统的思维都可以在吴越文化中找到根基。同样《今天》作者思想来源是我们一直关注的，在与《今天》相关的作家诗人访谈中，在各种回忆的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黄皮书”、“白皮书”、“灰皮书”，影响着一代人的书籍《麦田的守望者》、《在路上》、《娘子谷》、《人·岁月·生活》等多次被提及，后来俗称为“皮书”。这些被俗称为“皮书”的书籍对“异端”的兴起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现象。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大量的内部翻译出版物，很多与国外同步，或是有时稍晚一点，但是覆盖的面很广。<sup>④</sup>这些隐藏在民间并且流传的所谓的“灰皮书”、“白皮书”、“黄皮书”是我们讨论《今天》绕不开的话题，这些书有些已经重新出版，现在读起来并没有什么异类特殊之感，但在六、七十年代那是为了更好的反修反资而内部出版给有一定“免疫力”的领导和上层看的，然而事实上这些书籍还是在社会上一定范

<sup>①</sup> 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sup>②</sup> 洪子诚：《非主流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概述》，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第79页。

<sup>③</sup> 刘禾主编：《编者的话》，《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2001年，第xvi页。

<sup>④</sup> 沈展云的《灰皮书，黄皮书》（花城出版社，2007年）的出现就是围绕这个话题讨论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只可惜作者关于“皮书”的事远没说全说透，它关注的重点并不完全是内部资料的发行与流传，只是在书的第一章节中较多的谈及了一些出版情况，但事实上远不止书中呈现的内容，的确“‘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是很值得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皮书出版史’”这本书对本文撰写启发很大，有些问题它没有展开，但是提出了很好的话题，对思考问题，追述它的原点提供了思路。

围内流传开了。“皮书”在 60 年代到文革结束,由于基本上不允许公开阅读,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作为反面学习材料,所以它作为正规出版物的性质一直被忽略了。从《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 年—1986 年)》展示出来的目录可见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书是不可与当今出版业同日而语,总量恐怕是千份之一甚至更少,但当时的书,是无和有的区别,一本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sup>①</sup>。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这些“异类”的青年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甚至是一种神话,改写了文学史。“异端”思想还来源于文学网络:城市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组成的读书小组,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多层次的文学沙龙和文学社团。<sup>②</sup> 在文革时期这样的集会是不允许,但是沙龙的个人和群体仍坚持展开活动,在沙龙活动过程中他们将“异端”文学书籍和文艺思想带来了,带有“激情”地交流新思想、新观念。有趣的是交流比较顺畅的沙龙活动地点大多数是在管辖相对宽松的地区,在农村的知青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他们不是一心读圣贤书的青年,他们的志向在“庙堂”,有强烈的“庙堂意识”,这也正是他们在社会上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sup>③</sup>

《今天》和它的主编北岛<sup>④</sup>及《今天》的作者群,他们那个时代的“异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期的,它是站在一片废墟上开始的拓荒者。北岛他们是站

<sup>①</sup> 韩少功:《漫长的假期》,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2008 年,第 562 页。

<sup>②</sup>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提供了大量有关北京知识分子圈子里地下文学活动的资料,比较详尽,这对研究文革时期的沙龙提供了一定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学术整合、分析和辨析至关重要。但针对这本书“文革”时期的文学沙龙主要组织者之一徐浩渊曾有质疑,所以,核实一些事实是重现历史的根本,资料的来源、事件回忆者与当事者叙述的带有自身偏见及个人的意识的材料、历史事实,上述这几方面关系,都需要研究者仔细分析和深入了解背景,最终才可能提供有效的学术成果以馈读者。

<sup>③</sup> 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上海文化》,1993 年创刊号。作者把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了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庙堂意识”,指古代知识分子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价值,同时包涵了古代知识分子共同建立的文化专制;但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仍然“志于道”,也是他们在社会上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

<sup>④</sup> 《今天》在创刊时没有主编只有编委,但是在第一期之后,编委发生了分裂重新组刊《今天》,这次选出北岛为主编,芒克副主编。

在文学和精神废墟上的“异端”，除了关注文学本身，更多的是关注“裹在文学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学的东西”。<sup>①</sup> 北岛他们是“追究人生价值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只注重追求现代派的写作形式。在《今天》的创刊号上，有一篇《在废墟上》的小说，一个受到迫害不能和女儿团聚的父亲选择在废墟上死亡时，见到和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而和她畅谈之后，唤醒了父亲的求生欲望，“他陡然站起来，坚定地朝小姑娘消失的方向走去，连头也没回”。北岛借助小说提出了“废墟”的意象，这是北岛和他的诗人朋友们共同的认定。在北岛的写作中还有相当多的“废墟”意象，“荒芜的处女地”（《太阳城札记》），“灰烬般的人群”（《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森林般生长的墓地”《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红帆船》）。他们痛苦的挣扎，在废墟上他们没有颓废消沉下去，而是重新做人，北岛称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选择做一个人。“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砸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下，/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舒婷《一代人的呼声》）。

同时《今天》创刊号上，还刊登过一篇介绍德国“废墟文学”的译文《谈废墟文学》。“今天文学”和德国“废墟文学”是有些共同点，它们都见证了一场民族的灾难，或是战争或是革命，以及战争或革命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大规模破坏，也正是在这场灾难的废墟上质疑战争或者革命的意义。“我们从那场战争归来了，我们发现废墟并描写它。只是这种谴责的、几乎病态的声音是奇特的、多少持怀疑态度的”<sup>②</sup>。《今天》将在这样的废墟上产生的文学称之为“废墟文学”，更值得注意的是将所处的年代称之为“废墟”，无疑是对“文革”的否定。他们将《今天》作为战斗的武器，冷静地从文革中走出来，否定这个年代。他们以笑脸面对废墟，这带有苦涩的微笑来自他们内心中对“今天”的向往和“激情”，诗人在内心中升起了一种持久的感情，这感情不断地燃烧成甘愿付出生命只为寻求“疯狂的艺术”和人生真理。废墟的意象大多数是支离破碎的，但是越是这样不完美越是吸引人们去修缮，在凄美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综上所述，想要全面系统理解《今天》，必须深入《今天》的历史背景和文

<sup>①</sup> 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

<sup>②</sup> 《谈废墟文学》（译文），《今天》第一期，1978年12月。

本深处,从文本细读开始才能避免谈到《今天》就仅仅关注它所引起的“朦胧诗”论争,而忽视了其自身所蕴含的价值。

## 第二节 集体记忆:还原历史的可能性

新时期以来,围绕《今天》,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回忆性文章集以及个人撰写的回忆录。《沉沦的圣殿》<sup>①</sup>即是 90 年代出版的,追溯到六、七十年代,对于文革时期的诗社、社团的研究专著。这样的书写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其与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文革时期文化是一片空白形成了反差,在这个基础上,后继者才有继续追溯《今天》起源的可能性。洪子诚认为《沉沦的圣殿》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是“强调细节和资料性”的一种方式,同时又具有开放的特征,在叙事中他们在编排又潜在着“对历史叙述设定规——体现了历史性的‘焦虑’”。<sup>②</sup> 个人的记忆是细节而主观的,但是作为集体的记忆并加上编者的安排确实是一份分量不轻的历史的再现,对于文学史研究者而言的确是难得的资料。其作者的编排更在有意无意中体现出一种借助他者叙述历史的巧妙方式。

《持灯的使者》在众多关于《今天》的回忆书籍中是比较突出的一部。它是由海外复刊《今天》的《今天旧话》栏目加上一部分《沉沦的圣殿》文章构成的。这些文字更加准确地将《今天》的昨天、今天、明天呈现在我们面前。《沉沦的圣殿》、《持灯的使者》不是就《今天》而论《今天》,而是将《今天》置于更广阔的 70 年代乃至更早的“文革”前的文学图景中。重现《今天》是靠着记忆完成的,所以记忆的准确与否决定了重现的可能性与可靠性,重现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虽然不可能重演历史,让《今天》“成为新的正统”,但是可以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将《今天》回归到应有的地位上,这是当今参与回忆与评论《今天》的原因之一。关于《今天》的个人记忆也不断出版,潘婧的《抒情年代》即回忆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知青生活,虽然以小说面貌呈现,但是对于理解《今天》的历史颇有帮助;徐晓的《半生为人》从个人经历回忆《今天》实实在在的人和事。这些回忆性文字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理

<sup>①</sup> 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

<sup>②</sup> 洪子诚:《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8 卷,第 5 期。